

阿多諾在德國、阿多諾在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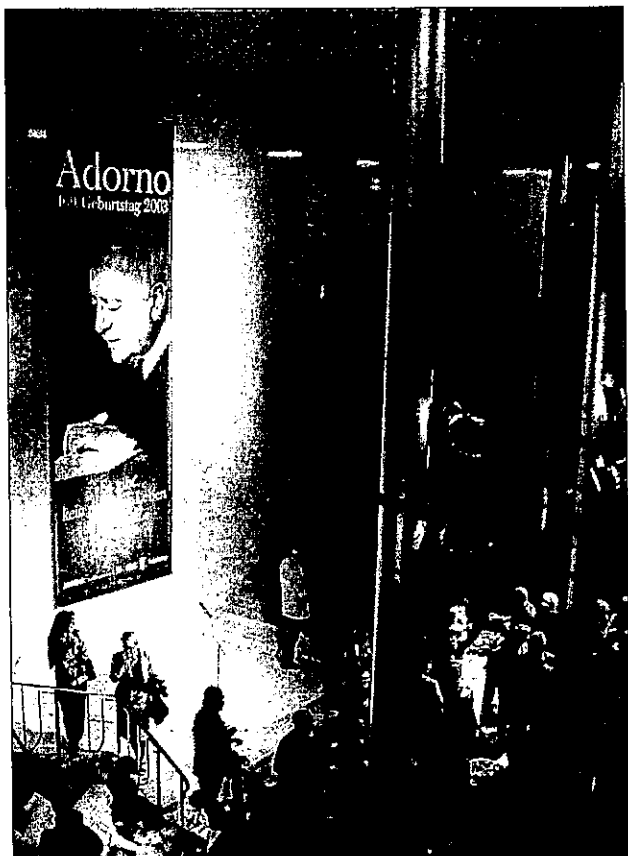
阿多諾現代性的鄉土化

●何乏筆

為二〇〇三年紀念阿多諾百年誕辰，至少六場研討會在德國及瑞士舉行。參加了四場之後，我回頭看早先自己在紫藤廬茶館所辦的「阿多諾講座」（參閱本專輯〈絕望與激昂之間：阿多諾哲學的當代啓示〉文），發現當時我注意的問題、關注的面向，在以德文為中心的討論會中完全受忽略。此一狀況促使我再度深入反省自己討論阿多諾的出發點及背景、反省「阿多諾在台灣」的意義何在。於焉開始將我對阿多諾的詮釋和轉化與阿多諾的移民經驗相互連接。在德國時，觀察到一些讓我驚訝的現象。

二〇〇三年阿多諾百年誕辰似乎變成了媒體事件，包含許多電視廣播節目、音樂

會、展覽（僅在法蘭克福便有三場）及研討會（應邀與會的學者大部分都是德文界的學者，有少數一些英美學者，除此之外完全



阿多諾的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幾乎成了媒體事件。

阿多諾在德國、阿多諾在台灣



紀念阿多諾的研討會、出版品等，都代表著「阿多諾現代性的鄉土化」。

沒有「非西方」的研究者參與），另外也出版了一連串與阿多諾相關的書籍（大部分為阿多諾傳記）。整體的狀況讓我感覺到，阿多諾實非常限囿於「德國」，形成狹窄封閉的現象。這些現象使我下判斷地認為，這些活動、研討會、出版品等都代表著「阿多諾現代性的鄉土化」（Provincialisierung der Adornoschen Moderne）。面對此情形，我乃決定藉此專輯作「阿多諾在台灣」此一主題的初步討論，並從移民問題切入阿多諾的現代性。在德國的討論會中，明顯地被忽略的是，純粹經驗與移民經驗的複雜關係對批判理論的深厚影響。這兩種經驗的交錯則可視為是阿多諾反省現代性的核心問題所在。

阿多諾的「名字」與移民關係



阿多諾把（猶太人父親的姓氏）自己名字中簡化為大寫的T，而以母親的姓氏為姓。

阿多諾的移民經驗可在他的「名字」上探索出蛛絲馬跡。在英文譯本上通常出現的是Theodor Adorno之寫法，德文本則用Theodor W. Adorno。此W所代表之意義為何？阿多諾在一九〇三年出生，他的父親是猶太酒商，名為Oscar Wiesengrund，母親的名字則是Maria Calveili-Adorno。阿多諾的出生登記姓名為Theodor Wiesengrund。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其著作出版上，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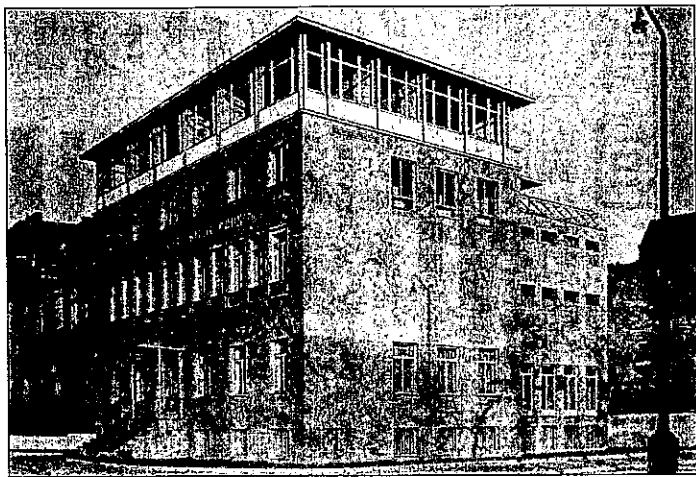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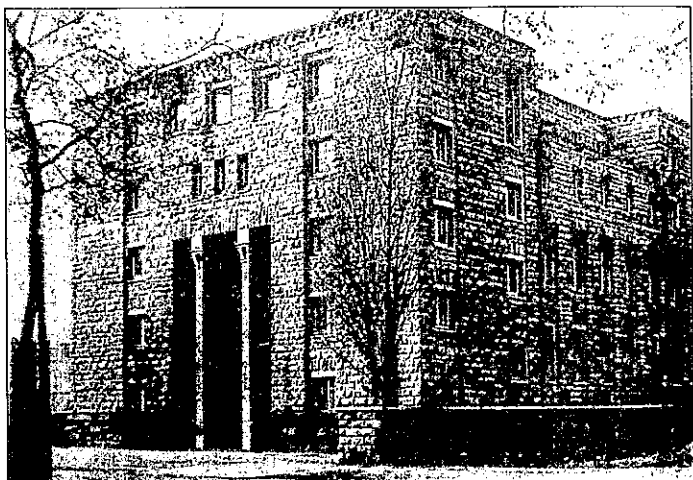
阿多諾是納粹政府歸類下的「半猶太人」。



阿多諾的出生地。

CON—TEMPORARY

的都是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此複姓。而在一九四三年取得美國籍時，護照上的名字則改為Theodore Adorno，中間的Wiesengrund便消失了。自此之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二次大戰前的舊址（上）與戰後重建的新館。

後，阿多諾便都以Theodor W. Adorno之名簽署於其著作出版上。從姓名的轉變可以看到阿多諾的移民歷程。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諾從在納粹政府歸類下的「半猶太人」（父親為猶太人而母親不是）的角色，逐漸選擇（或者被逼著選擇）母親的名字。之後原本顯而易見的猶太名字便簡化為記憶性的符號。

阿多諾的移民是一迂迴曲折的過程。一

九三四年他先到英國，在牛津大學再次成為博士生，但直至一九三七年，他還是會定期回德國探望父母和未婚妻。一九二八年，阿多諾則與妻子移民美國，成為社會研究所遷移至紐約的成員。

在紐約與洛杉磯旅居十二年後，於一九四九年回到法蘭克福大學。直到一九五一年，「社會研究所」才得以重新開幕。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研究所在法蘭克福重新成立時，是因為曾經移民美國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等人才得到美國政府在經濟上的補助，而他們的美國經驗更成為當時學術上的優勢。

我想透過《最小道德學》的一段，來進

一步討論阿多諾的移民經驗。（註一）我在此僅要闡釋其中的一個觀念：「安居不再可能」。阿多諾引尼采的一句話：「我的幸運之一就是沒有房地產」。他認為這句話在今天應再作補充：「道德的一部份乃是，不要安於居住在自我之中」。在此阿多諾把「安居不再可能」的觀點推至心理層面。意思是說，在自我與自我的關係中，已經不可能把自己看成像「家」一樣的地方來居住，換言之，一般的「自我認同」，把自我看成穩固的立足點，但就阿多諾而言，此一觀念已然過時。當然，整個十九、二十世紀的歐陸哲學，都不斷地圍繞著這樣的問題，對自我的同一性或非同性的問題作愈益深入的探索。從尼采或從佛洛伊德來看，自我已經不是、也不可能在自己「家」中當主人，將自我看成「內在城堡」。阿多諾試著將此觀念與歷史經驗連接起來。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否定辯證法》中的自我觀，與《最小道德學》中的道理極為接近。因此，我認為阿多諾的移民經驗是一直到其晚期著作哲學發展的重要軸心所在。阿多諾這樣的觀點，在現今的哲學及文化研究中並非陌生。阿多諾提出這個想法的特殊性何在？出於對兩件事情的反省：個人的移民經驗與「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所象徵的歷史災難。阿多諾的「現代性」以這兩者的交錯為中心。

阿多諾在德國、阿多諾在台灣

CON—TEMPORARY



阿多諾在台灣？本專輯試圖用現代漢語的獨特資源，摸索出跨文化哲學的一些可能性。

當今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無法接受將「奧斯維辛」當作現代性的主要面向來分析。在這方面，阿多諾的反省模式較接近學者如鮑曼

(Zygmunt Bauman) 和亞甘賓 (Giorgio Agamben) 所進行的研究。(註二)

絕望與激昂之間：阿多諾

「不要安居在自我之中」

「道德的一部份乃是不安於居住在自我之中」，我以這句話作為〈絕望與激昂之間〉一文的出發點，而試著說明「阿多諾在台灣」的意涵。「不安於居住在自我之中」這句話是某種文化經驗的結果，也是阿多諾文化理論的判斷標準之一，但另外也蘊涵著某種自我對自我的要求、一種「自我修養」的過程。我對阿多諾的詮釋則從文化 (culture) 與修養 (cultivation) 之間的關係出發。對阿多諾的詮釋乃試著從自我修養的問題來重新反省阿多諾的代表著作。自我修養之角度的形成，雖然與我對傅柯 (Michel Foucault) 晚期思想的研究也有密切的關係，但「自我修養」作為一種多元及跨文化的問題，是在台灣逐漸形成的研究角度。而此方向確實與阿多諾哲學的形成模式有所相應。

因為我從研究阿多諾的過程中，所看到和學習到的一種模式，確實試圖讓主觀的經驗與客觀的知識之間產生緊密的互動關係，即是徹底「舉行」主體化的經驗與客觀化的知識之間的辯證。哲學在整個科學研究的領域中，應該就經驗與知識的關係作深

入的探索。由此看來，主體與真理之間的橋樑就是某種自我對自我的工夫。阿多諾對於此關係的思考，則成為我展開修養概念的出發點之一。而提出另類修養論的可能性，含有走出歐洲理論範圍的必要條件。在此只想將自己的阿多諾研究與台灣經驗的關係當成例子來看，認為對某種「西方理論」而言，在台灣的學者應該更積極地將個人的、在地的特殊經驗與概念的工作連結起來。大體上「阿多諾在台灣」都停留在某種單純地接受或平凡地介紹之中；停留在「進口概念」的遊戲之中，而缺乏實驗與轉化的勇氣，缺乏厚度與獨特性。

「德國哲學」的轉化點

漢語哲學一旦要轉化西方理論，其實是

具備有相當條件的。中文世界已經歷一百多年的翻譯及接受西方文獻的歷史，一開始，翻譯及接受的過程或許是被迫的，因有某種外在暴力的動力而發生。但這一百多年翻譯與接受的歷史，到現在已成為值得正視的優勢。就此過程所蘊涵的哲學潛力，批判理論甚至整個當代西方哲學界幾乎一無所知。但我認為，本專輯（絕望與激昂之間：阿多諾哲學的當代啓示）對於阿多諾的詮釋，便是奠基在此歷史工作上，而試圖運用現代漢語所提供的獨特資源，摸索出跨文化哲學的某些可能性。阿多諾的著作吸收了德國哲學自康德以來的養分；在我看來，他帶領所謂「德國哲學」到一種轉化點。對他而言，「德語」作為他的「家園」，而移民經驗只讓他更加相信德語乃是唯一能充分表達其思想的媒介。但在阿多諾（以及海德格）之後，

似乎相信德語獨特潛力的學者已煙消雲散。在今天，我個人則深自體會，思想的某些主要面向，以現代漢語反更能直截地呈現出來。在語言上，此一嘗試所帶來的「貧簡化」，應遠超出阿多諾英文書寫經驗的桎梏，然而這種嘗試對他且在他的時代卻是無法想像的。

在阿多諾哲學的討論中，我將要闡明超出他自己局限的內在力量。能夠透過在台灣的经验、在台灣的反省而展開一種特殊的詮釋脈絡，本身就具有其獨立價值和必然性。德國的阿多諾專家是否支持或肯認這樣的嘗試，則涉及學術的國際政治，而與哲學本身的力量毫無相干。換句話說，即便思想的厚度與獨特性是肯認的基本條件；但若一開始便浮現此被肯認之欲望，卻會鯨吞蠶食培養此一條件的可能性。

（註一）：參閱本專號《最小道德學》選集，No.十八。（頁四六）。

（註二）：可參閱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9.（鮑曼著，楊

渝東，史建華譯，彭剛校，《現代性與大屠殺》，南京：譯林出版社，二〇〇一。） 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種落差的體會確實是相當痛苦的。但在同時，我一直記得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曾經說明他為什麼不再選擇母語（英語）而開始以法文寫作。貝克特說，用法文寫作讓他的語言更爲「貧窮」。這樣的觀點，確實與下文中將要討論的阿多諾美學中的、指貧窮而簡約的「貧簡化」（Vernunft）概念有所呼應。對我而言，用中文寫作是非常自覺的選擇。以下的文章作爲一種嘗試，就其語言方面的不足，請讀者多多包涵；但就其所呈現的閱讀而言，絕對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代表著我透過使用中文來投入一種「減損態度」的嘗試，也代表著我對阿多諾哲學之獨特體會的初步整理與開展。

主體與真理

在與通常的科學理想的尖銳對立中，辯證認知的客觀性對主體的需要不是較少而是更多。不然，哲學經驗將會枯萎。（註一）阿多諾在《否定辯證法》一書中明確批判實證主義之時代精神。就辯證認知的客觀性而言，他認爲主體的經驗爲一不可或缺的要素。阿多諾之強調主體經驗，確實與一般的科學理念形成強烈對比。他不僅尖銳的批評實證主義的、以量化爲標準的經驗觀，同時



阿多諾把自己的著作《最小道德學》題獻給好友霍克海默（圖）。

對於作爲其成長環境的生命哲學和現象學及關於「生命／生活」、「體驗」、「具體性」、「直接性」等的迷思也有所保留。阿多諾強調在哲學研究過程中必須充分實現主體經驗與客觀真理間之辯證。因此，我的討論將由經驗概念出發。

阿多諾著作中，最能清楚表現哲學經驗觀念作用的厥爲《最小道德學》一書。此書爲由個人經驗出發之哲學反思，因而在書中，真理與經驗間的張力有著至爲清楚之呈現。阿多諾在給予友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題獻」中說道：

我對我朋友作此奉獻，實源於那自遠古以來即視爲是攸關哲學真實領域之哀傷

科學，然而，自哲學化爲方法論以來，已然淪爲知識之怠忽、格言式奇想，並終至茫然若失，即：正確生活的教學。（註二）

由此看來，哲學在歐洲逐漸從某種「生活的學問」轉化爲以方法論、實證論或自然科學爲研究標準之研究。不過，自十九世紀以來，德國哲學中則出現一種反對運動，學者紛紛強調具體性、經驗、生活、生命、現象、身體等觀念，而對此哲學趨勢，阿多諾則確定他自己的哲學工作：

哲學家過去所謂的生活，已成爲私人的及純消費的領域，作爲物質生產過程的附屬品而被拖動，沒有自主性或自己的本質。誰想知道關於直接生活（unmittelbares Leben）的真理，必須詳察其異化的形式，以及那些直到最隱微之處決定個人存在的客觀力量。（註三）

若消除哲學在生活方式與科學研究之間的位置，不啻抹殺了哲學的核心意義。在他看來，哲學在歐洲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僅止於思辨哲學，亦不僅是方法論，而是與「生活／生命」（Leben）息息相關之哲學。但在現